

六易寒暑

陈立平

1
94

六 易 寒 暑

——太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回忆

陈 立 平

六 易 寒 暑

陈立平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门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5 字数 50,000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11100·103 定价: 0.22 元

前 言

我写回忆录，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为纪念全国解放十周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向一些老战士、老干部征文，希望我们把战争年代的斗争历程，用报告文学、故事、回忆录等形式，真实地反映出来，以鼓励、鞭策、教育年轻一代。我那时工作较忙，只写了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太湖风波》等回忆片断，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我下决心继续把太湖流域革命回忆录写出来。我这里所指的太湖流域，主要包括京沪铁路以南的武进以南、宜兴以北、无锡以西以南及苏州以西的范围。这一地域的浙江杭嘉湖地区，完全为敌伪顽势力所控制，苏浙皖边为国民党三战区所占据，我们只能死守这块弹丸之地，坚持抗日斗争。无数革命先烈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最后的一滴血。我是直接参加这一地区斗争达六年（自一九四〇年春至一九四五年秋）之久的幸存者之一，忠实地客观地反映这一地区的斗争史实，是我的职责。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击。而且人类的发展历史，必然由低级到高级，由愚昧无知到科学昌明。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在历史长河中，有暗礁，有险滩，但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我们是时代的讴歌者，要

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激励人们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奋勇前进！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本书由凯攸等同志协助整理，谨此致谢。

一九三九年冬，新四军成立了由陈毅、粟裕同志任正、副指挥的江南指挥部，统一指挥大江南北各路抗日健儿。一九四〇年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前委命令我去太滬地区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此之前，前委已派张之宜同志率连排级干部八人去了太滬。

太滬地区位于京沪线(今沪宁线)南侧，太湖与滬湖之间，由武进、无锡、宜兴三县交界处构成。敌伪在这南北约六十余华里、东西约一百六十华里的锯齿形的三角地带，派驻了重兵。宜兴驻有日军独立十一旅团的一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分驻和桥、丁山、张渚、徐舍等地)，设有宪兵司令部、警备司令部，此外尚有伪军任援道第二方面军部的六团、伪省保安队宜兴总队。常州驻有日军十八旅团的一个大队，并设有“领事馆”。武(进)南的湖塘桥、雪堰桥、鸣凰、运村、南宅以及常州飞机场均有伪军驻扎。无锡驻有日寇海军陆战队。整个太滬地区，几乎每隔八九里就有一个日伪据点。敌人守望相助，互为进退，彼此呼应，残酷镇压抗日民众，肆虐横行，无恶不作。而在太滬地区的北面，则还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军保九旅，窥测时机，蠢蠢欲动。到这样一个地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敌后根据地，工作确是很艰巨的。然而又是非常光荣的。

当时陈毅同志已去苏北，粟裕同志代表前委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跟我们作了一次谈话。记

得，我一到那里，粟裕同志就对我说：“稍等一下，还有个同志就要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话正要讲下去时，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黑粗布棉袄裤的大个子走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在搞秘密工作时有过交往的李复同志。不等粟裕同志介绍，我们的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粟司令拉开墙上的布幔，只见那地图上南京四郊插满了白旗，水西村南面山区插满了黑旗，以水西村为中心插了一面红旗和一些小红旗。一眼便可以看出，我茅山根据地已被压缩在不等形的狭长地带。粟司令一边用手在地图上测量着，一边说：“我们被压缩在这长不足二百里、宽不过五六十里的狭长地带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精神振奋地说：“江山得靠自己打出来，不能靠乞求施舍！”他告诉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新四军主力一部已挺进苏北，敌、伪、顽苦心经营的夹击堤坝已被冲破。……

在粟裕同志向我们具体交代了深入太漏地区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后，我和李复分别提出了一些问题。粟裕同志有的给我们作了解答，有的则要求我们通过实践去解决。

几天之后，前委正式宣布成立“太漏抗日行动委员会”。盛计然和我分别任正副主任；委员会下设军事、财经、民运三科，由程维新任军事科长，李复任财经科长，张之宜任民运科长。

盛计然和程维新是太漏地区两股地方武装的首脑人物。这两股地方武装实行合并，命名为“人民抗日义勇军”，由程维新兼任队长，张之宜兼政治处主任。“人抗”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和指挥。

一切准备就绪，即日就要出发了。

出发的那天，粟裕同志亲自前来给我们送行，又亲自给我

们发了枪支弹药。指挥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了最大的努力，发给我们步枪十支，手榴弹二十枚，轻机枪子弹一千五百发。

这些装备，比之于武装到牙齿的敌、伪、顽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将使用这些简陋的武器，在沦陷区开辟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满怀坚定信心的。

我们十几个人，肩扛枪支，踏着坚实的步伐，向着太漏地区进发了。

程维新是和桥一个商人的儿子。一九三七年，正当他行将从上海一所工专学校毕业的时候，淞沪战争爆发了。不久，淞沪失守，南京等地也相继陷落，工专学校内迁浙东。为了求得一张毕业文凭，他由南京徒步去浙江丽水，开始了流亡生活。目睹国土沦亡、民众涂炭的惨状，激起了他的悲愤之情。他与许多青年一样，参加了救亡活动，和同学一起组织了救亡剧团，在颠沛流离中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程维新的家乡和桥沦陷了。程维新的父亲程猷大是和桥数一数二的富商，担任商团团长的职务，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日军侵占和桥后，立即将他抓去，强迫他当和桥的维持会会长。碍于自家的生命财产，程猷大不敢拒绝，但他尚未丧尽良心，不愿真正为日军效力。所以，他表面接受当维持会长，暗中设法同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保持联系。国民党第六十师附属苏浙皖边游击总司令谢生标的部队，曾一度占领宜兴城，攻克和桥镇。该师副师长命程猷大组织游击队，暗中配合行动。于是程猷大很快地集合起百余人，又筹集了八十多支步枪，组成一个大队。谢生标委任程猷大为大

队长，并派石一峰一个连充实该队。一次，日军迁回到国民党军队的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程猷大闻讯后，迅速率部赶去掩护，边打边向太湖边退却。不料石一峰率部叛变，劫持程猷大，缴掉了所有的枪。国民党新来接防的第五十九师得到消息，火速派一个加强连追击，程猷大乘混乱时逃跑了。他隐姓埋名在太湖灵台一带避难。但是，过了不多久，被汉奸发觉，向日军告密，他再次被捕。程猷大被捕不久屈服于日军的淫威，当上了和桥的伪维持会会长。这件事使当时以抗日为时髦的程维新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久，他姊夫的哥哥王渭溪写信给他，邀他回家乡组织队伍抗击日军。这个建议正合程维新的心意，他想，只有回去抗日，才能洗刷耻辱，取得社会的谅解，“乱世出英雄”，这也许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就这样，程维新回到家乡，拉起队伍，打起了游击。而程猷大也在暗中接济程维新。

对程维新这个人，我们觉得，只要他愿意抗日，就要团结他，对他进行教育和培养，并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加以考察识别。我和李复、张之宜同志商量决定，对这支刚刚归入新四军的队伍有必要进行一番整训和教育。

这个决定，在“太湖抗日行动委员会”、“人民抗日义勇军”正式宣布成立后，立即付诸实施。

“太湖抗日行动委员会”和“人民抗日义勇军”在闸口镇举行隆重的仪式，宣布正式成立。这使太湖地区敌伪势力大为惊慌、震动。

驻守和桥的日军中队长中野一面严加戒备，一面密切注意我们的动向，准备随时出动，消灭新生的抗日武装。我们几

乎每日夜晚都在秘密转移，今天在此安营，明日又到别处扎寨，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打击敌人。

有一天，部队刚抵达离闸口镇两里路的蒋家村准备宿营，忽然，有位老乡匆匆地赶来报讯，说他从镇上买菜回来，发现有一群日本兵从和桥出发了。

紧接着万石桥、闸口方面也来人报告：日军正沿着公路朝万石桥方向开来。

我们正在研究这一突如其来的敌情，又有人跑来报告：大约有一个排的日军，配有两挺机枪、一门小钢炮，已过万石桥，逼近闸口了！

接着，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在进入闸口镇后便停下来做饭了。据了解，敌人在五洞桥截住两只木船，准备午后从水路折回和桥。

我们分析了敌情，认为这不象是奔袭，而是一次侦察性的行动。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不给敌人一点教训，我们就将失去主动。从力量来看，我们的兵力是占压倒优势的；而且敌人经沿途骚扰、负载抢掠，已经疲惫不堪，而我们的部队则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正是一次极好的战机。

程维新原来顾虑部队成立不久，打硬仗没有把握，有点犹豫，听了我们的分析后也认为应该打，而且能够打好，经过实战，对部队的战斗力也是一次很好的考核。

我们制订了一个袋形作战方案：以小部兵力牵制第一条船，而以两个加强排集中火力聚歼第二条船。于是决定，由王渭溪和李丹桂率一个排，直奔河对岸，控制制高点。他们的任务是：当敌人进入袋形阵地后，放走第一条船，立即封锁袋口，

猛烈射击后一条船，迫使敌人上岸。程维新和张之宜率两个加强排，埋伏在河岸两边，专候敌人上岸，奋力聚歼。除张之宜率短枪班组织后勤并负责打扫战场外，其余人员均留守原地，作为后备。

命令一经下达，部队迅速潜入了指定的阵地。战士们个个屏气禁声，目不转睛地注意瞭望河面。

敌人的两只木帆船渐显清晰，船头上的膏药旗轻轻抖动，船儿逆水驶进，上下颠簸，渐渐钻进了“口袋”。王渭溪一声喊“打”，刹时间，排枪、机枪齐发，密集的火力对准第二条船猛烈射击。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乱作一团，有的被我枪弹击毙，有的溺入水中，有的则极力摇船靠岸，拚死爬上河岸来。

我们的队伍已在岸边伏候多时，一见敌人上岸，便猛冲了上去。敌人惊魂未定，顷刻间就都被打下水去了……

这一场战斗以敌人的惨败告终。除第一条船上有六七七个日本兵上岸仓惶逃回和桥之外，第二条船上的日军两个班死伤殆尽。

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和辎重物资，仅武器就有小钢炮一门、“三八”式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十余支。

当晚，中野闻讯后，亲自率领部队赶到出事地点。只见到了两条千疮百孔的木船倾斜在岸边，船上岸边尸首狼藉，还有躺在血泊中的重伤员在呻吟、哀号……

“人抗”初战告捷，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打击了敌人的狂妄气焰，中野不敢轻举妄动了。

二

遭到我们初次打击后的日军变换手法，使出了另一花招。他们在集镇以及大路旁的屋墙上，贴出了由中野和宪兵队长那苏签署的“通缉布告”，悬赏通缉程维新、张之宜和我。

张之宜同志揭了一张“悬赏通缉布告”回来，给我们大家看。李复看了一眼，哈哈笑起来，说：“这张纸，除了吓唬有神经衰弱症的人，毫无用处！”

程维新皱了皱眉头，说：“用还是有用的，可以用来擦屁股。”

本来，在初战告捷以后，武器充实了，部队发展了，战士们互相间更团结了，斗志也更旺盛了，程维新对此十分满意。可是，在平时的谈吐中，他有意无意流露出一种情绪，觉得部队已经有了一块不小的地盘，能在敌后站住脚了。当人们谈论新四军的成绩时，他总要言及“我程维新怎么怎么”，显出一种沾沾自喜、不胜得意的样子。也许正由于存在这种情绪的缘故，他对于瞬息万变的敌情就缺乏应有的估计了。因此，当他看到日军的“悬赏通缉布告”时，思想上既觉得意外，难免有点惊慌，却又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我和李复认为，日军在下乡窜扰受到了打击后，马上到处张贴这样的布告，目的很明显，是企图在群众中制造恐怖与混乱，下一步必定还有新的行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张之宜同志补充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盘据太湖边邾

溪港的伪军杨连生部，近来很活跃，不断插入我中心区域骚扰，一住几天，赖着不走。杨连生还扬言要在几天之内消灭‘人抗’，活捉程维新。同时，漕桥的伪自卫团也频繁活动，抓走好些地方乡绅、头面人物，但是抓了又马上放回来。”

李复沉思片刻，说：“依我看，中野和那苏利用两股伪军对我扰乱，仅是一手；另一手是软的，对上层分子施加压力，企图分化、孤立我们。针对这软硬两手，我们必须首先稳住阵地，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力量，然后进行反击。”

程维新听了，也认为李复的分析有道理。

正在这时，哨兵进来报告，说有谈、蒋两位老先生要见程维新。那两人都是地方士绅，与程维新的父亲程猷大很相熟。程维新和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让他们进来。

谈、蒋两人进来后，和程维新寒暄了半天，却不说明真实来意。程维新有些不耐烦，便问他们究竟来干什么。他们这才取出一封信交给程维新，说：“我们与令尊大人是世谊之交，和世弟也有一面之缘，地方士绅委托我们代转杨连生的一封信，实在是情面难却。”又说，“回话和复信，当代为转达。”

程维新拆开信封，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将信交给我和李复、张之宜看。原来，这是杨连生写来劝程维新投降的信。我们看了付之一笑，把信还给了程维新。程维新将正在擦着的手枪朝桌上一扔，板起面孔说：“原来你们是替杨连生下劝降书来的，胆子真不小。我认识你们，我的这支手枪可不认识你们！”

谈、蒋两人吓得脸色大变，连声说：“世弟，别……”

程维新暴跳如雷，气咻咻地骂不绝口。

我们低声劝住了程维新，对谈、蒋两人说：“两位除了送信

件，还有何贵干吗？”

程维新指着我们三个，说：“陈立平、张之宜、加上我程维新，悬赏通缉的全在这儿了。这位李复先生，该早听说了吧。”他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回去，告诉杨连生，就说我程维新在这儿等他来‘活捉’。”

谈、蒋两人唯唯诺诺，不敢言词。

我说：“你们在杨连生控制下，身家性命都操在他的手中，被迫无奈替他送这封信，我们新四军是可以谅解的。”

谈、蒋两人连连点头。他们说，最近杨连生一反常态，对他们十分凶狠，强迫他们每天报告新四军“人抗”的活动情况，不报告就作“通匪”论处。他们感到自己报不是，不报也不是，左右为难。只好委派代表向杨连生疏通、求情。杨连生提出，由他们出面与新四军谈判，双方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彼此尊重、互不侵犯。

李复问：“所谓的势力范围，怎样划分呢？”

他们听了，似乎觉得事情有成功的希望，便说：“杨连生的意思，可以按武宜公路为界，越界行动事先联系。”

程维新一听，拍着桌子说：“好一个划分势力范围！你们在替谁讲话，帮谁做事？给你们戴一顶汉奸的帽子，一点也不冤枉。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哪里有日本人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打。杨连生算什么东西，汉奸！我们早晚要收拾他。”

李复不动声色地插话说：“有话讲出来总比不讲好，当面讲总比背后讲好。你们是代表了一部分地方士绅来的，对你们的处境和苦衷，我们表示理解和谅解。”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我也要奉劝你们，杨连生危害地方，残杀乡民，甘心充当汉奸，除非他缴械投降，否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知道你

们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财产，才替杨连生传话的，但你们千万不要学他的样子。”

谈、蒋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极是，李先生说得极是。”

我说：“今后就由李先生和你们保持联系。”

李复含笑说：“欢迎两位常来走走，以后我也要去拜访你们的。”

谈、蒋两人走后，程维新对李复与我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我们初到太湖地区，虽然打了一次小胜仗，但尚未站稳脚跟，对杨连生等部伪军的内部情况也所知甚少，更主要的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所以不能操之过急，要团结更多愿意抗日的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程维新利用自己的影响，对那些地方士绅多作些工作。程维新感到我们的意见比较中肯，若有所悟地表示赞同。

一九四〇年春末夏初，收茧子的时节，我们收到了前委发来的火急电报。

“太湖工委：

前委命令老二团从茅山根据地出发，路经你们地区，协助你们打开太湖地区局面，然后向路东挺进。老二团由徐绪奎率领已经出发，你们立即派负责同志前往丹（阳）、金（坛）、武（进）地区的里庄桥接应，十万火急，不得延误。

陈 毅

看过电报，我们几个负责同志非常兴奋，商量如何接应。去里庄桥要经过从茅山到太湖的陆路交通线，沿线都是顽伪

勾结控制的伪化区，有国民党的游击队和游击政权。白天行动目标大，很难插过伪化区。但时间不能拖延，决不能等到晚上，因为老二团已进入了丹、金、武地区。我们研究后觉得唯一的捷径是从常州城闯过去，这样才能及时接应上老二团。走这条路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正因为常州是日军巢穴所在，所以敌人往往反而较少注意，只要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就有钻过去的可能。

于是便决定由李复同志和我带领一个三人短枪组出发。我和李复装扮成两个穿长衫的道学先生，三名短枪战士穿上了农家常穿的短袴裤，每人胸前都挂着一条盖有伪乡公所印章的白布条——“良民证”，与寻常行人一样。我们从前黄镇插上公路，直向县城南门方向走去。

我们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湖塘桥。公路的一侧矗立着一座碉堡，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哨兵，正忙于检查进城百姓携带的物品。我们夹杂在人群里，钻了个空子混了过去。

进城后，在一处茶馆里休息。李复同志找来了他在武进的一个学生，了解城里的情况。这个学生是位进步青年，我们凡有人进城，都向他了解情况。他放低声音对我们说：

“今天城里有点紧张，早上抓了几个人，你们得赶快走。”

我告诉他：“我们有特殊任务，西门有没有什么情况？”

他说：“直到昨晚为止，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于是，我们马上动身，出西门走上公路。经过马公桥时，突然发现桥上有日军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并强制过路的老百姓抬土，抬过就放了，又找后来的接替。我们决定闯过去。乘前面的人被日军拉去抬土时，我和李复同志便从敌人身后擦了过去，短枪组的同志也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视线，紧跟了上

来。

然后，我们从公路插入乡间小道，快速行军到了里庄桥，很快地找到了联络站。这时已日落西山。我们急切地询问着老二团的行踪，可那里的同志说：“老二团进入这里后，当天晚上就向东挺进了。”

我们扑了个空，心中十分焦虑。只得在黑夜中，赶回前黄镇，到时天已大亮。我们立即派人四出联络，打探消息。可是一连过了两天，老二团杳无踪影。

老二团到底在哪里呢？他们初到太滬，敌情不明，环境不熟悉，行动困难，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找到他们！

第三天天没亮，有两个老百姓从东面急匆匆地跑来找我们。一个中年人说：“我们那里晚上来了一支队伍，穿着旧得补了又补的灰色军装，不象国民党军队，也不象其他游击队。进庄以后，睡门板、铺稻草，帮老百姓挑水……”听他一讲，我高兴得一下子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老二团还能是谁呢？

送走两个农民，我立即与李复同志商议，由他去和顽方乡长联系，安排部队的宿营地点，我自己去接老二团。

我化装成农民模样，挽了个篮子，里面放了酱油瓶，象上了一趟街的样子。进了那个庄子，见岗哨臂膀上果然佩带着“新四军”的符号，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我向岗哨说出了自己的身分，哨兵马上把团部指给我看。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进了屋子。

我一进屋就高喊：“徐团长，我们来了！”徐绪奎同志正睡意朦胧，听到我呼唤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老陈啊！见到你真不容易呀！刚到这个地区，第一天吃了鬼